“4.23世界读书日”开卷有约

花地 上書房

“4·23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花地·上书房”专栏开启，羊城晚报记者将走进各领域名家、达人的书房，探访他们的读书生活与研究路径。读者可借此一窥名家书斋，遇见更辽阔世界。

“我的书房二十多平方米。没有书房时，常做书房梦，甚至想给书房起个像样的名字。

如今，我很少去书房。写东西，我抱着手提电脑，躺在卧室的床上写。书房里的书，被一次次清理，因为大多无用，甚至是垃圾。幸亏当年没给书房起个名字，要不羞死了。”

肖复兴，北京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在北大荒插队六年。著有各种杂书200余部。近著有《家记》《我的学生时代》《一年好景君须记》（江苏文艺出版社），以及儿童小说《小放牛》。

雪村画的肖复兴书房一角

阅读史

「读书有味聊忘老」

□肖复兴

我第一次读有关文学的书，是花一角七分钱，在家对面的邮局里买的一本《少年文艺》杂志。那时，我上小学四年级。杂志中有美国作家马尔兹写的一篇小说，名字叫《马戏团来到了镇上》，特别吸引我，至今记忆犹新：小镇上第一次来了一个马戏团，两个来自农村的穷孩子从来没看过马戏，非常想看，却没有钱；他们赶到镇上，帮着马戏团搬运东西，可以换来一张入场券；他们马不停蹄地搬了一天，晚上坐在看台上，当马戏演出的时候，他们却累得睡着了。

可以说，是这篇小说带我进入文学的领地。它在我心中引起一种莫名的惆怅，一种夹杂着美好与痛楚之间忧郁的感觉，随着两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睡着而弥漫起来。应该承认，马尔兹是我文学入门的第一位老师。

我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这是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老校，图书馆里的藏书很丰富。管理图书馆的高挥老师，知道我爱看书，破例让我进图书馆随便挑书看书。图书馆是不许学生进入的，我是当时唯一一个享受这样待遇的学生。我就是从那里找全了冰心在1949年前出版过的所有文集，找到了应修人、潘漠华、郑振铎的诗集，黄庐隐、丰子恺的散文，以及郁达夫、柔石的小说，找到了屠格涅夫的六部长篇小说和契诃夫所有的剧本，还有柯罗连柯的《盲音乐家》，泰戈尔的《新月集》《飞鸟集》和《吉檀迦利》，以及萨迪的《蔷薇园》和日本女作家壶井荣的《蒲公英》。

高老师对我一直很好，即使“文革”期间图书馆被封，她依然从图书馆里找到我想看的书借我。一直到我去北大荒之前，我还从她手里借到赫尔岑的《谁之罪》、屠格涅夫的《罗亭》及《三家评注李长吉》三本书，带到北大荒，一直未还。

学生时代的阅读，影响人的一生。

以后，北大荒和返京待业的日子里，读书最有收益。那是一个文化凋零极度书荒的时代，对艰难中寻寻觅觅得到的书，便越发珍贵，才如饥似渴地看得越发仔细吧。

在北大荒，我从兽医站钉马掌的曹大肚子那里借到书，他是当年到北大荒十万转业官兵中的一名上尉，喜爱文学，家里藏有好多的书。只是他不让我去他家，第一次借书，他让我写个书单，我写了三本：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伊萨科夫斯基的《论诗的秘密》、艾青的《诗论》。他居然都有，从他家里找到借给我。他家是我在北大荒的图书馆，我一直借书直到我离开北大荒。

在北京，我从中学语文老师田增科和王瑗东那里借到《苕溪渔隐丛话》《中国画论辑要》《人间词话》，还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雨果的《九三年》。我又从中学同学那里借到《巴乌斯托乌斯基选集》的上册。再有，便是到呼和浩特的姐姐家，偷偷地溜进她工作的铁路局的图书馆，偷走了《契诃夫小说选》上下两册中的一本。

因为很多书要归还，所以我抄了其中很多，这样的读书和抄书，对我帮助很多，帮我度过那一段“四人帮”即将倒台的黎明前的黑暗时刻。这些书影响了我的思想、感情和写作。

我最初的写作，便是在北大荒喂猪的猪号里开始的。我陆续写了十篇散文，得到了当时刚从河南五七干校回京待业的叶至善先生逐字逐句的批改和鼓励。1972年，在复刊第一期的《黑龙江文艺》上，发表了其中一篇《照相》，这是我的处女作，从此歪歪扭扭走上了这一辈子的写作小径。

如今老了，如放翁诗中所说：读书有味聊忘老。读书是一种很好的养老方式。只是长的东西看得少了，常放在身边的是《剑南诗稿》《读杜心解》、巴乌斯托夫斯基《一生的故事》，还有契诃夫、孙犁、汪曾祺的短篇文集。最近唯一读的长篇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是重读，只最后一卷，写得真的是好，惊心动魄。眼看着俄乌战争，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重读此书，感慨良多。

“少年纵有千场醉，老境唯存一束书。”放翁的这句诗，链接起我这一辈子。也足够了。

[书径]

“重读和抄书。孙犁说：抄一遍，胜过读十遍。桑塔格说：最有价值的阅读是重读。我信。”

[书语]

“万事到前心静，一书相对眼明。”

[近读]

米哈伊尔·肖洛霍夫（俄）：《静静的顿河》（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冈本加乃子（日）：《金鱼缭乱》，陕西人民出版社

陆游：《剑南诗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孙犁：《如云集》，山东画报出版社

王仁兴：《谷食中国》，三联生活书店

[自荐]

《我的学生时代》（肖复兴）

编辑在封面写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说人生是一部电影，学生时代便是片头曲。这是一部作家肖复兴的成长之书。”

札记

就像人有善恶，人工智能的使用也有利有弊

莎士比亚台词的启示

□张薇

众所周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有一段著名的台词，“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朱生豪译）显然，当莎士比亚将人比作天使和天神时，潜意识里就已经把天神、天使的层级置于人之上。

公元4世纪叙利亚的尼默修斯主教就曾说过：“没有语言能形容人这个生物的多样高贵与优势……他科学知识渊博，技艺不凡……他能与天使甚至上帝对话。他是万物之长。”欧洲中世纪流行着宇宙神圣层级制的观点，13世纪意大利神学家、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曾用文字描述了“智性之梯”，他把宇宙分成八层，第一层是石头，第二层是火，第三层是植物，第四层是动物，第五层是人类，第六层是天空，第七层是天使，最高层是天神。显然，天神和天使排在了人类的上面，人类之下是动物、植物、火、石头，于是人类成了世间万物的灵长，根据他的描述，产生了一幅宇宙层级图。

中世纪加泰罗尼亚哲学家、神学家拉蒙·柳利也表达了相同的宇宙层级的意思。15世纪的西班牙神学家塞邦的《自然神学》的简写本由蒙田翻译成英文，塞邦所阐述的“存在之链”也沿用了中世纪的宇宙层级论，他认为首先是初等存在，即非生命物质，如元素、液体、金属等，向上一级是有生命、无感觉的生物，如橡树等，再向上一级是有生命、有感知的生物，如贝类、蚂蚁、马、狗等，第四层是人类，不仅有生命，而且有感官和理解力，人高于万物。人的上方是天使，然后是神。莎士比亚无疑继承了这种看法。

自古希腊到中世纪末，神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神是至高无上的，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迎来了一次根本性的革命，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反对神权，强调人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第一次从哲学意义上赋予了人崇高的地位，随之讴歌人的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层出不穷。莎士比亚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浪潮中，超越了阿奎那、柳利和塞邦的观念，剥离掉那神圣层级论的神学的面纱，莎士比亚赞誉人类，把人比作天神、天使，这是对人的价值的至高礼赞，哈姆雷特的这段台词就是最典型的写照。

哈姆雷特在德国威登堡大学接受人文主义的教育，秉持的就是这种对宇宙和人类的看法，尽管哈姆雷特最后说：“在我看来，这泥塑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那是因为他遭遇了父死母嫁、同学背叛的重大变故后才产生对人的怀疑，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总观念仍然是时代的主流。人的理性和智慧越来越彰显，“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如果我们把哈姆雷特的反讽之意暂时撇在一边，单看这样有气势、有激情的排比句，其对人的赞美达到了极致。

当今天我们单独抽出莎士比亚写的这段台词来欣赏，不得不说，它是对人的价值和力量的最好评价。人类的智慧是无穷尽的，现在人工智能AI以势不可挡的威力迅猛地发展，这就是人类的创造，它不是神创造出来的，是人研究开发出来的，是人类智力的体现，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人类。

当然，就像人有善恶，人工智能的使用也有利有弊，研发前提必须是在人的道德伦理的框架内运行，用理性来规范这种新技术，规避风险，不能有悖人伦，要使人们生活得更便利、更美好，让世界变得更现代、更文明，而不是成为宇宙万物的破坏者，不要堕落到如哈姆雷特所鄙夷的“人又算得了什么”那样的低下境地，更不能被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所毁灭。

【有感于思】 **阎晶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略说阿来

前几天，在上海参加了阿来创作研讨会，概略谈了如下印象。

在中国当代文坛，阿来是极其耀眼的存在，他的作品始终具有极强的阐释度，使其成为批评家们热情追踪的对象。

阿来是自带“文化”的作家，这种文化几乎具有与生俱来的特点，而且关涉民族、宗教、语言以及生活本身，等等。这或许是边地出身的作家天生具有的特质，很容易成就他们在文学上的独特性，而阿来则是其中特别突出的一个。

阿来的创作具有全方位突破的特征。从诗歌起步，在小说上获得极高成就，纪实类的创作如《瞻对》一样受到关注，在影视剧创作上也拥有自己的作品如《攀登者》，近年来他行走于大自然间，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作品，结集出版《大河源》等，同样受到众多读者的追捧。

阿来的创作不只是体裁上的完整，题材、主题更体现出开掘深广的特点。仅就小说创作而言，长中短篇都有高峰之作，表现生活的界面也在无限延展。《尘埃落定》《格萨尔王》的广博自不待言，《机村史诗》这样的当代题材作品，同样具有生活真实与史诗、寓言相结合、融合的特质。长篇小说《云中记》又一时成为“主题创作”的亮点，带给创作者、出版者以诸多启示。

阿来40余年多产而多面的创作，又蕴含着统一的特征，共同的气质，相近的品质，从而形成他无可替代的文学世界和文学生态。

25年前，阿来的高峰之作《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我本人也是从那一届开始参与到茅奖的评奖工作中。连续七届之后回望，我个人认为，《尘埃落定》无疑属于灿烂星空中十分耀眼的明珠。在过去的25年里，这部作品产生着持续反响，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不断呈现，小说本身不断重印，显示出这部作品所具备的当代经典的影响力。

【梅川随感】 **陈子善**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叶灵凤的“回归”

今年是个特别的年份，有待纪念的现代作家特别多。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是林语堂、周瘦鹃、张恨水、郑逸梅诞辰130周年，冰心、凌叔华、俞平伯、李金发、阿英、夏衍、曹聚仁诞辰125周年，冯至、戴望舒、施蛰存、臧克家、焦菊隐诞辰120周年，钱钟书、曹禺、师陀、艾青、萧乾诞辰115周年，张爱玲、汪曾祺诞辰105周年。这些作家都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都值得纪念，应该纪念。

此外，还有一位对海派文学和香港文学都卓有贡献的叶灵凤，今年也是他诞辰120周年，当然也不能忘记。上海巴金图书馆将在5月上旬举行“纪念叶灵凤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座谈会”。会上将首发叶灵凤的两本书，一本是短篇小说集《紫丁香》，收入叶灵凤1932-1937年间创作的带有“新感觉派”风味的短篇小说《紫丁香》《朱古力的回忆》《夜明珠》等共13篇。这本短篇集当时本拟由现代书局出版，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月刊已多次刊登预告，但直到《现代》停刊，现代书局关门大吉，也未能出书。后来，叶灵凤又增写了几篇，并发表了小说集的自序。书未及出版，全面抗战爆发，叶灵凤携带书稿，远赴广州参加《救亡日报》的抗日宣传工作，因广州沦陷，书稿也化为灰烬了。《紫丁香》未能问世，这是叶灵凤的一个永久的痛，而今他的遗愿终于可以实现了。

另一本是《爱书趣味：叶灵凤收藏的藏书票》。叶灵凤是中国第一位公开介绍西洋和日本藏书票的作家，他自己也制作了有名的“凤凰”藏书票。全面抗战中，他的家人冒着战火，把他珍藏的西洋和日本的丰富多彩的藏书票带到香港。叶灵凤曾撰文表示希望举办一个展览会，展出这批幸存的藏书票，但由于种种原因，也一直未能实现。现在叶灵凤的后人把这批珍贵的藏书票捐赠给上海巴金图书馆，同时出版经过整理和考订的他收藏的藏书票集。这是一次别有意义的回归，叶灵凤如泉下有知，也当颔首而笑吧。

【夕花朝拾】 **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1984年的广东有哪些变化？

1984年广东的变化，首先来自行政的“松绑”。很多我们熟悉的划分，来自80年代初。让我们看看，报纸中的广东是怎么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据《1983年第四季度全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变更情况》，其中广东省的变化比较大，如下：

一、撤销佛山地区。将南海、三水、顺德、高明四县划归佛山市管辖；将开平、台山、恩平、新会、鹤山五县划归江门市管辖；将斗门县划归珠海市管辖。

撤销中山县，设立中山市（县级）。

二、撤销汕头地区。将澄海、潮阳、揭阳、揭西、普宁、惠来、饶平、南澳八县划归汕头市管辖；将海丰、陆丰二县划归惠阳地区。

撤销潮安县，将潮安县的行政区域并入潮州市。

三、撤销韶关地区。将南雄、始兴、仁化、乐昌、翁源、英德、阳山、连县、乳源瑶族自治县、连南瑶族自治县、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共十一县划归韶关市管辖；将清远、佛冈二县划归广州市管辖。

四、撤销湛江地区。将徐闻、海康、廉江、遂溪、吴川五县划归湛江市管辖；将高州、化州、信宜、电白四县划归茂名市管辖；将阳江、阳春二县划归江门市管辖。

五、撤销梅县、梅州市。梅县与梅州市合并，设立梅县市（县级）。

1984年4月6日在北京结束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建议进一步开放由北至南14个沿海港口城市，作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新的重要步骤。这14个港口城市包括广东的广州、湛江。这些港口城市同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

这次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会期一共12天。座谈会讨论了如何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问题，认为各特区都应改革管理体制和管理机构，使特区的管理能够对国际市场的频繁变化作出灵敏反应，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使特区既有发达的物质生产，又有高尚文明的社会风貌，真正成为“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

●随手拍

瑶乡桃花

图文 廖祖平

“人间四月芳菲尽，瑶乡桃花始盛开”。4月，游客身穿少数民族服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柳家乡观赏盛开的桃花，体验民族风情。

随手拍专用邮箱：ycwbwyb@163.com

【拒绝流行】 **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传学院教授

当“食堂阿姨”的北大硕士

选择当“食堂阿姨”的北大新传硕士小黄，一句“自洽赢过一切体面”“我更想吃体力的苦”，在内卷内耗纠缠着年轻人的当下，引起诸多讨论。人们努力去理解“北大硕士当食堂阿姨”并建构一种类似“勇敢追求生活”“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劳动最光荣”的意义机制，但我总觉得，北大硕士自洽了，但社会远没有自洽。自洽是自己的事，想在别人那里建立自身的自洽意义，强行自洽，强行理解，终究是很拧巴的。

众多声音中，很多人都努力表达对她的“理解”。但说实话，这种“理解”更多是一种置身事外与自己无关时“表演包容”的圣母视角。你能接受一个北大硕士毕业后当食堂阿姨吗？最好的答案并不是“接不接受”，而是：这是一个错位的问题，别人的选择，不需要你接不接受。她自洽就行了，不需要别人的理解。你愿意捐一千万吗？愿意！你愿意捐一辆车吗？不愿意，因为真有一辆车。

不需要别人理解，别人可能也理解不了，这更多是一种个体选择，个人在自身特殊情境、特殊心境、特殊价值追求下的选择，并在选择之后形成了一套自洽的认知。她的情境，跟别人不一样，她的选择，在其他人身上可能是不可复制的。

这个北大硕士一直在强调“自洽”：体力劳动中的自洽，自洽赢过一切体面。自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渴求他人理解”的阻断，这个自洽，是自己有一个意义闭环，而不是期待通过外界的理解进入他人的意义闭环。

内卷和内耗，就是活在“他人理解”的魔咒中，由他者凝视的目光主导自己的选择和塑造自己的人设，这是一种顺从性的“他治”，囚禁主体的闭环。体面，风光，就预设着那个他者目光。自洽赢过一切体面，翻译一下就是：我自己快乐就行，不需要别人的理解。所以，种种所谓“理解”的社会逻辑，其实都是在与这种“自治”背道而驰，人们太追求被他人所“理解”了！

【昙花的话】 **尤今** 新加坡作家

当作文课遇上AI

人工智能（AI）横空出世之后，担任驻校作家多年的我，遇上了前所未有的棘手问题——我发现部分学生提交的作文，内容扎实、行文流畅，没有任何错字或病句，连标点符号也精准无误，我竟然无法改动哪怕一字半句。

我把其中一篇堪称完美的学生习作上传至人工智能（AI），询问是否由它生成的？它回答：“这篇文章是否由人工智能生成，不能仅凭写作风格判断。”它随即贴心地提出了三种验证方法：

“其一，询问学生本人，如果学生能够详细说明此文的构思、修改的思路和写作的过程，或可证明作品的原创性。其二，查看学生以往的作文，对比学生的写作风格、语言表达习惯是否一致，从差异中或可找到线索。其三，要求学生口头复述或现场重写，看是否能保持相似的表达方式与思维逻辑。”

上述验证方法，或许适用于在校任教的老师，然而，对于仅仅负责几堂创意写作课程而争分夺秒的驻校作家来说，是无法用上的。

人工智能如同洪水，无孔不入，无法阻挡，也无须阻挡；如果运用得当，如虎添翼，可以成为学习的强大助力；然而，当我们使用它时，心中必须要有一把道德的尺子，严密地进行自我监督、自我管束。

我认为，目前校方的当务之急是对学生进行“诚实面对自我”的道德教育，唯有这样，人工智能才不会沦为大众的抄袭工具。

【不知不觉】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执行主编

文学需要读者，而非粉丝

世界读书日临近，各个平台尽其所能，列出各种影响力的书籍榜单。曾经在调研的时候，听人说，国内读书数据很多来自青少年，一个成年人一年实际阅读的书，其实数量惊人地少。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前几天听出版方介绍，阿来《尘埃落定》（纪念版）目前已经销售了七八十万册。这本已经出版25周年的书，想必读者已经迭代多次，却显然对抗了流逝的时间。昨天有位朋友还发来他重读《尘埃落定》仍旧感觉很妙的一页描写……

就像读者会想念并记住他一生里影响深远的某些书、某些人一样，我想，作家心目中，也会描摹他理想的读者吧？作家阿来在采访中说，文学需要的是读者，而不是粉丝。读者与粉丝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是否展开“真正的阅读”肯定是其中一条。

想起多年前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的一本书，那本书有着一个美好的名字：《读书这么好的事》。开篇他说：“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书里讲述了古今中外的读书故事，记住了那个在战火中沈从文衣袋藏书的小故事，它说明，阅读的本质不是环境的特权，而是心灵对自由的主动选择。除了读书之美，书里也讲述“真正的阅读”的方法，精读和略读，如何筛选书籍，作者还讽刺了一种“伪阅读”现象：那些堆砌书架的装饰性藏书、社交媒体制造的阅读幻觉，实则是“用信息的肥胖掩盖精神的贫血”。

在今天，AI技术可能更容易解决“速读”的焦虑，但阅读的快和慢，都是相对的。正如这部书中所言，“读书是让每个日子都成为与永恒相遇的庆典”。这种相遇，在你带着生活阅历重返文本时，可能尤为明显。经典的阅读，不同时期重读，认知的光芒可能都不一样。在海量数据时代，人类阅读的不可替代性恰在于：那些在文字中沉淀的思考温度、在重读中发酵的认知升华、在对话中生长的精神宇宙，始终是无法复制的生命印记。